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唐吐蕃  
大食  
政治关系  
史

王小甫 著

## 引 言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9）的长期地方分立中间只有西晋统一了二十余年之后，到隋朝（581—618）实现了统一。然而，在隋统一以前，突厥曾长期是北中国的太上皇。北齐（550—577）、北周（557—581）争相与突厥结好，“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可汗（572—581）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sup>〔1〕</sup>隋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曾使突厥可汗俯首称臣<sup>〔2〕</sup>。然而，隋朝毕竟祚短。隋末丧乱，“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sup>〔3〕</sup>隋末起事的各支队伍几乎都引突厥为援，包括李渊，到唐朝（618—907）初年还是如此<sup>〔4〕</sup>。

突厥霸权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统一，这就是迄至唐朝建立时亚洲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最主要内容。

从七世纪中叶开始，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在传统的南北农牧分立局面中，加入了冲出沙漠的大食人和走出高原的吐蕃人，他们内部统一起来的原因尽管有很大不同，但都成了亚洲大陆上全新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此，旧大陆政治地理的空白完全消失了，旧大陆的历史却因而增加了新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唐、吐蕃、大食这三方在当时说来社会历史、文化截然不同，却几乎是同时开始向外经营的。629年，一支大食人的军队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南部地区，这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向外部世界进行征服的第一步<sup>〔5〕</sup>；630年，唐灭北突厥，置西伊州<sup>〔6〕</sup>；634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遣使唐朝，638年入

寇松州<sup>〔7〕</sup>。三方发动的时间相差最长不过十年。然而，三方却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先后达到其对外发展顶峰的：大食在715年（屈底波并波悉林远征拔汗那时遇害），唐朝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在792年（攻陷西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历史研究工作者从各方面进行探讨，尤其是从各方自身社会结构和内部发展上去探究。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唐、吐蕃、大食关系史构成了七世纪中叶迄八世纪末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正是它们的活动盛衰影响着这一百六十多年亚洲大陆的政治发展。这一时期正是中亚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前夕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时候，今天属于中国的西部疆域及其毗连地区大都已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但是，这一段重要历史内容在国内外学界都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近年日本的森安孝夫（1984）和美国的Ch. l. Beckwith（白桂思1987）先后发表两部论著，由于引用文献各有局限，还不能说已填补了这段空白。可见研究本课题既有学术意义就探讨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来说，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唐、吐蕃、大食三方共同发生关系的地方在中亚（Central Asia）我国传统称之为“西域”所以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这一地区。

#### 注释：

〔1〕《通鉴》卷一七一，5314页。

〔2〕见《隋书·北狄传》。

〔3〕《通鉴》卷一八五，5792页。

〔4〕见《隋书·北狄传》，1876页。参《通鉴》卷一八五至卷一八九，武德元年（618）至武德五年。

〔5〕希提1979，171页。

〔6〕《旧唐书·突厥传》上，515页；《新唐书·突厥传》上，6035页。

〔7〕见两唐书《吐蕃传》上。

# 第一章 唐朝统治西域与吐蕃的介入

## 第一节 唐朝的西域统治

### 唐朝初期的西域经营

六世纪中叶，原来服属于柔然的突厥 (Turks) 部落兴起于金山之阳 (阿尔泰山南面)，546年突厥灭高车，尽降其部众。552年，突厥破柔然。567年左右，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嚙哒 (Hephthalites 西方称之为“白匈奴”)，于是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南自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都落入了突厥草原帝国的控制之下<sup>(1)</sup>。583年，突厥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 (583—657) 最初与萨珊波斯以乌浒水 (缚乌河，即 xus，今阿姆河) 为界。在从六世纪 80 年代到七世纪 20 年代的四十多年里，西突厥与东罗马帝国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或 Byzantium, 395—1453) 结盟，连年向波斯开战。到统叶护可汗 (约 619—628) 时，西突厥的政治势力达到全盛，东以金山 (阿尔泰山) 为界与北突厥 (即东突厥第一汗国，583—630) 抗衡，西南抵末祿河 (Merv-ü ch，今阿富汗木耳加布河) 上游与波斯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域。《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sup>(2)</sup>。可见，突厥草原帝国对被征服的绿洲地区实行的是一种间接控制而非直接占领的霸权主义统治，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波斯和东罗马都在长期的战争中大大削弱了，这就为大食 (即阿拉伯人) (Arabs) 的兴起和扩张创造了条件<sup>(3)</sup>。

七世纪初，唐朝建立后不久，突厥草原帝国东、西二部也都相继由盛而衰。唐朝初期经营西域，就是从消灭突厥的霸权开始的，

而且最终在东、西两面都取代了突厥的霸主地位。

唐朝在建立其西域统治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活动与成就：

贞观四年(630)平北突厥，置西伊州<sup>[4]</sup>。贞观六年(632)去“西”字，称伊州(今新疆哈密)。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sup>[5]</sup>；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sup>[6]</sup>。

贞观十八年(644)讨焉耆(今新疆焉耆)<sup>[7]</sup>。

贞观二十二年(648)平龟兹(今新疆库车)<sup>[8]</sup>。

永徽二年(651)十一月，因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将安西都护府由交河迁高昌故都，命高昌王后裔鞠智湛前往镇抚<sup>[9]</sup>。

显庆二年(657)平贺鲁<sup>[10]</sup>，同年，诛龟兹大将羯猎颠及其部党，置龟兹都督府。次年五月，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sup>[11]</sup>。

在平定贺鲁的过程中，唐朝已开始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如永徽五年(654)闰五月以处月部落置金满州，隶轮台县<sup>[12]</sup>。显庆二年(657)春正月，分葛逻禄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焮俟部置大漠都督府<sup>[13]</sup>。显庆二年平贺鲁，十二月乙丑下诏分西突厥地置昆陵、濠池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sup>[14]</sup>、昆陵都护，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濠池都护。并令弥射、步真与卢承庆一道将投降的西突厥诸姓按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都督、刺史以下官。实际上，这道诏令的实施主要是显庆三年(658)的事，即是年五月安西都护府徙于龟兹以后的事。此后，唐朝又四次在西突厥故统辖地设置羁縻都督府、州等：

第一次在显庆三年(658)，据这年十一月将贺鲁俘到京师时所知的情况，已将贺鲁种落(即西突厥十姓部落)各置都督府，分属昆陵、濠池二都护府<sup>[15]</sup>。同时在其所役属诸国也分置州府，并隶安西

都护府。史料中讲到这里往往都说：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其实这只能是就唐平贺鲁从而征服了西突厥这种大势来说的。因为，显庆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的儿子真珠叶护仍然据有吐火罗（Tukh rist n, 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以及阿富汗东北部的阿姆河上游流域），该地区大部分还没置州县；有的地方虽在显庆三年设了都督府，到龙朔初才授其王都督<sup>[16]</sup>。总之，昆陵、濛池这两个羁縻都护府是专为分统西突厥十姓部落左、右厢而设置的。虽然弥射、步真均为西突厥始祖室点密可汗五世孙<sup>[17]</sup>，但所谓“兴昔亡可汗”、“继往绝可汗”都不是统一的西突厥十姓可汗，因而也不再具有从前那种役使绿洲诸国的霸主地位。显然，唐朝征服西突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对绿洲诸国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唐朝的这一意图，从其经营西域的进攻方向也可以看出来。在唐朝取得高昌、焉耆以后，646年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642—651）曾遣使向唐请婚，唐太宗即提出要他“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sup>[18]</sup>。其意图非常明显。因此，尽管后来西突厥余部竭力想恢复其旧有势力，但唐朝决不允许并全力制止这种企图。这便给吐蕃介入西域提供了契机。所以，迄今为止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唐朝支持突骑施在中亚同大食对抗<sup>[19]</sup>不过是误解史料而产生的错觉，其实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共破突骑施苏禄倒是事实（见本书第四章）。

第二次是在显庆四年（659）。这年三月，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之。据《通鉴》卷二 记载 同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考虑到安西都护府已迁龟兹，于阗早已在唐朝的庇护之下<sup>[20]</sup>，我们认为 本年疏勒 今新疆喀什 置州就标志着著名的安西四镇正式设立<sup>[21]</sup>。唐初安西四镇主要是作为安西都护府的下一级派出机构，分片镇抚葱岭以东的南部绿洲地区，以取代

突厥对这里的传统控制。这一地区本来还有朱俱波（即朱驹半，今叶城）、渴盘陀、葱岭、筹绿洲小国。唐朝仅置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显然是重点设防、分片负责的战略。此外，在唐初军事上镇防与征行两套制度并存的情况下，边镇也不可能象盛唐时期那样大批驻军。《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说：“每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唐初安西四镇各镇兵力状况大抵如此。据业师张广达教授研究，唐灭高昌以后，作为唐朝经营西域基地的西州，当地人力状况十分紧张<sup>[22]</sup>。了解这一点对于客观地认识唐初西域各种势力组合变化的原因十分重要。《唐六典》卷三 都护、副都护条：“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覘候奸譖、征讨携离。”同卷又说：“镇将、镇副掌镇捍防守、总判镇事。”由此可见，唐初安西都护府与四镇的活动方式大致也与当时的各种征行相似，即主要靠兴发当地蕃兵蕃将来征讨携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当地蕃人与其他势力连兵，安西四镇便岌岌可危，甚至不得不撤回西州。就在安西四镇设立的这年十一月左右，就有贺鲁部将阿悉结阙俟斤都曼<sup>[23]</sup>帅疏勒、朱俱波、渴盘陀三国反，击败于阗。有迹象显示，都曼进攻于阗很可能意在“南结吐蕃”（详见本章第四节），同年，唐派苏定方讨平之<sup>[24]</sup>。

第三次是显庆五年（660），来济任庭州刺史，“请州所管诸蕃，奉敕皆为置州府，以其大首领为都督、刺史、司马，又置参将一人知表疏等事”<sup>[25]</sup>。这应该就是龙朔二年（662）于庭州置金山都护府的基础<sup>[26]</sup>。

第四次是龙朔元年（661）。是年，因吐火罗款塞及波斯王卑路斯请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唐朝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州、县及军府，并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sup>[27]</sup>。

至此，唐朝以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的统治。

贞观四年（630）唐朝灭北突厥时，“四夷君长诣阙请上（指唐太宗。一引者）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sup>〔28〕</sup>。这一事件意味着唐朝皇帝在新的统治秩序中的地位变化，标志着亚洲大陆上的一个新的政治时期的到来。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就此评论说：“于是由于承认唐朝皇帝是北方各族的最高君长，各族与唐朝便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直接关系。”<sup>〔29〕</sup>天可汗在西域的影响尤其深远，降至天宝年间还有这种称呼<sup>〔30〕</sup>

###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形式

唐朝对西域的统治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层是伊、西、庭三州的州县制 这里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最初几任安西都护<sup>〔31〕</sup>中至少有两人明确带有‘使持节 督 西伊庭三州诸军事’的职衔<sup>〔32〕</sup>。伊西庭三州这种行政分职、军事合一的体制以后便一直保留下来。安西都护府迁龟兹以后，不久又在庭州设立金山都护府管理在贺鲁种落设置的羁縻府州。但是 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 伊西庭三州在军事上一直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是认识和理解唐朝西域各军政建置之间关系的关键。开元（713—742）年间设节度以后 在节度与都护分职时，伊西庭节度衙多半就驻在西州。

第二层是安西四镇的羁縻制。

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sup>〔33〕</sup>，我们可以归纳出唐朝羁縻府州的以下性质：

1. 羁縻府州是为保证唐朝的永久安全和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而在边疆地区诸国、诸部设立的。它们必须执行唐朝法令 管理好本府州，互相之间不准随意攻伐侵掠。

2. 羁縻府州设都督、刺史、司马、参将等职官。都督、刺史这些长官都由本部首领担任，都是世袭职务。

3. 羈縻府州按规定都属边州都督或都护管领。

4 羈縻府州有无版籍不定 即使有版籍 徭赋也比齐民百姓要轻；无版籍的多半是随地畜牧。

5 羈縻州往往采用当地或附近城镇、部落的名称。

确实 与大唐皇帝同时又是天可汗一样 羈縻制度下的部落酋长、小邦国王同时又是唐朝官吏。所以 谷川道雄认为 唐帝国表面上由都督府、州这样普遍的行政组织统一起来了 实际上内部并立着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胡汉共存的统治方式<sup>[34]</sup>。然而，我们认为 唐朝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除了谷川所说的“两个世界”以外 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一个介乎州县制与小邦国王间的过渡形式，这就是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才是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具体表现的地方。

如前所述 安西地区已经设立了羈縻州(到高宗上元年间又增置四镇都督府)唐朝又在这一地区设四镇镇抚 这就形成了一套胡汉结合、军政并行的统治制度。由唐朝的制度可以推知 仅次于都护府的安西四镇当属于“上镇二十<sup>[35]</sup>”之列。一般说来，每镇应有防人五百<sup>[36]</sup>。镇有将一人 镇副二人 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镇副下有录事一人 诸曹均有若干佐、史之类的流外官。镇以下有上、中、下戍 均有戍主 上戍有戍副一人<sup>[37]</sup>。但是 初唐四镇并非盛唐镇守军 安西尚无汉兵镇守 四镇组织未必十分健全。

四镇作为边镇 其功能在于“镇捍防守”<sup>[38]</sup>。然而，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派出机构 其职能应与都护府一致 即“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覲候奸谲、征讨携离”<sup>[39]</sup>。这些就决定了四镇与羈縻州以及后来设立的四镇都督府的关系 二者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 但四镇还负有代表中央抚宁蕃人的责任。而且可以肯定 镇将和后来的镇守使一样 都是由汉人武将来担任的<sup>[40]</sup>。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 镇将可以兴发蕃兵蕃将或协助他们作战。总的说来 唐代以戍边机构镇守地方当始自初置安西四镇；但当时的安西四镇却只有防人而无镇军。由于有戍边机构镇守 就把安西都护府辖下的四镇地区同

该府所辖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其他地区对唐朝来说基本上是鞭长莫及<sup>[41]</sup>。但由于当时四镇只有少量番上的防人<sup>[42]</sup>本身不能胜任大规模作战而须依赖后方基地支援<sup>[43]</sup>，因而形成了唐初与吐蕃在安西四镇反复争夺的局面。直到长寿元年（692）王孝杰复四镇后以汉兵三万防守<sup>[44]</sup>，这才增加了安西四镇的御敌能力，此后安西都护府未再迁动可为明证<sup>[45]</sup>。

第三层是安西四镇以外的其他羁縻府州。这些地方无汉将镇捍防守，与唐朝保持朝贡、册封等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有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唐朝对他们‘虽不能尽保护的责任，但如有胡国对于唐有所妨害，或‘无藩臣礼’的时候，安西都护府是会代表唐政府执行讨伐责任的。’<sup>[46]</sup>

当然，以上三层统治形式所涉及的地域并非固定不变的。早在唐德宗时期（780—805）苏冕编《唐会要》就发现：“咸亨元年（670）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元年（692）十一月复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sup>[47]</sup>至后晋刘昫修《旧唐书》在《龟兹传》中说：“先是太宗既破龟兹（即贞观二十二年事。——引者）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sup>[48]</sup>。近人遂多以为四镇初置即有碎叶而无焉耆。其实，郭孝恪已在争夺龟兹时身歿<sup>[49]</sup>，不可能在破龟兹后出任都护。1979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五年（654）冷狐氏墓志》等资料表明，贞观二十二年（648）破龟兹以后，安西都护府仍在西州活动，并没有移置龟兹<sup>[50]</sup>。据研究，《旧唐书·龟兹传》此段是在摘录神功元年（697）崔融《拔四镇议》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sup>[51]</sup>，其说不可凭信。就四镇而言，按照唐朝开始经营西域的意图——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唐朝初置四镇只能有焉耆而不会有草原地区的碎叶。只是后来由于吐蕃的进入使得隔断二蕃（吐蕃和西突厥余部）成为唐朝的主要战略目标时，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

## 第二节 吐蕃的兴起

### 吐蕃兴起以前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早在远古时期，我国的青藏高原就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联系。1956年在青海省霍霍西里西南曲水河河岸，1964年在西藏自治区定日县东南苏热山南坡小河阶地，1976年在西藏自治区申扎县雄梅区珠洛河畔山麓，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这里的椭圆形长边刮削器、长条形圆头刮削器和钝尖的尖状器等，在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也屡有发现，表明当时青藏高原和华北地区可能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sup>〔52〕</sup>。

1990年8—9月，首次进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工作队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位于西藏拉萨市北郊5公里的曲贡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五百多平方米，揭露了一部分遗迹，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的曲贡人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耕作为主，兼营畜养和渔猎。虽然农作物品种尚不清楚，但从出土大量收割器具和加工谷物的磨盘看，当时已有了大面积的谷物种植。大量兽骨和鱼骨及渔猎具的存在，说明畜养和渔猎也是生活资料的两个重要来源。曲贡村遗址是目前国内发掘的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比1978年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高出近六百米。发掘者认为，曲贡村文化遗迹“表明拉萨河谷的开发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藏族先民在那里创造了悠久的文化，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大体与内地是同步发展的，看不出有明显的落后因素。这也表明青藏高原中心地带很早就有农耕部落繁衍生息，并不只限于猎牧一种文化遗存”<sup>〔53〕</sup>。

在曲贡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迹遗物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

意：一是在打制石器上普遍涂抹红颜色的做法 另一个是在陶器上附塑的猴面装饰。在意大利藏学家杜齐（G. Tucci, 1894—1984）刊布的藏族史前文化遗物中，有在拉萨出土的各种手制、轮制陶器，器形虽然不一 但都在“上面涂有闪闪发光的红色”还有在拉达克的列城出土的“一些陶罐上装饰着深红色的图案”<sup>〔54〕</sup>。据汉文史料记载 吐蕃“以赭涂面为好”<sup>〔55〕</sup>。赭就是一种红色颜料。由此可见，青藏高原的古代文化有一定的连续性。在藏族民间普遍流传有藏区最初由“神猴”与“岩魔女”相结合始有人类 称吐蕃为“猿猴”种系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文献上始见于十四世纪成书的本教史《雍仲本教目录》（G·yung drung bon gyi bstan pa'i dkar chag）和佛教史书《红史》（Deb ther dhrar po）等<sup>〔56〕</sup>。曲贡村遗址猴面附饰的发现 有可能将这一传说的起源追溯到史前时期。然而 这一发现的更重要意义还在于，在杜齐教授刊布的藏族史前文化遗物中也有两尊猴像 他指出：“在极为广阔的区域 甚至在遥远的米努辛斯克都发现了猴像这一主题”<sup>〔57〕</sup>。米努辛斯克盆地在俄国南西伯利亚地区。据该国考古学家吉谢列夫 C. B. Кицевский, 1905—1962 的权威研究，那里的文化从青铜时代后期（约前第 2 千年中）开始便受到中国北方商殷文化发展的影响<sup>〔58〕</sup>。杜齐教授说：“根据所有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在西藏存在着一种从新石器传统发展起来的巨石原始文化。这一文化沿着两条路线传播。一条通过库库诺尔（即青海。——引者）地区的欧亚大平原通道进入西藏中部，或许一直延伸到后藏。另一条进入克什米尔和毕底（Spyi ti），现有的可用资料还不足以证实这一结论。”<sup>〔59〕</sup> 他的谨慎态度是对的。因为 就断代来说，卡若文化的年代在距今 5,500—4,700 年之间 曲贡遗存的年代目前估计相当于卡若文化晚期或再晚些 但无论绝对年代还是发展阶段都明显早于上述米努辛斯克盆地诸文化。所以 即使真的存在杜齐教授所说的文化传播路线 其中进行的文化传播方向可能也要比他设想的复杂得多

1990年9月，在拉萨北郊曲贡村还发掘了一处石室墓地，共发现清理了二十余座墓和六处祭祀石台。发掘者认为曲贡村石室墓地的年代上限相对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在吐蕃初期约公元六、七世纪<sup>[60]</sup>。在该墓地 区 203号墓出土的一枚铁柄铜镜特别引人注目，发掘者怀疑其或为南亚次大陆某种古代文化的交流品<sup>[61]</sup>。一般认为，世界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系统：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的铜镜，往往为圆形，附有较长的柄；中国的铜镜多为圆形，镜背中央设钮以穿绦带，没有柄。到了唐宋时代才出现有柄的铜镜<sup>[62]</sup>。考虑到上古时期欧亚大陆各地区间陆路交通远胜于海路交通的情况，不能排除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铁柄铜镜有可能是直接来自葱岭以西的文化交流品。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不宜对古代青藏高原与南亚次大陆的文化联系估计过高。一个重要的史实是，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创于北印度，到公元前后已经西域传到内地<sup>[63]</sup>，但却到吐蕃兴起以后才于公元七世纪传入西藏<sup>[64]</sup>，这时印度佛教已经开始衰落了<sup>[65]</sup>。

直到吐蕃兴起以前的青藏高原与葱岭以西的文化交流，目前国内藏学界谈论最多的莫过于古老本教的起源问题。与此有关的内容主要是两点：即西藏本教传自其祖师先饶米沃 Gshen rab mi bo的诞生地 Stag gzig<sup>[66]</sup>，以及本教中渗入了祆教等因素问题<sup>[67]</sup>。Stag gzig在藏文文献中多半是指西藏西方或西北方广大地区<sup>[68]</sup>。国内常有人将其直接译为汉文“大食”一词，未必妥当。汉文史料中的“大食”通常指的是公元七世纪初叶兴起的阿拉伯帝国，与本教发展的历史不合。考虑到汉文“大食”一名实际上来自波斯人对邻近的阿拉伯部落的称呼 T z k，而且早在八世纪上半叶的古突厥文碑铭中就被用来泛指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 (Tajik)<sup>[69]</sup>；本教的某些教义明显受到波斯国教——祆教的影响，由于七世纪中叶波斯已亡于大食，而传世本教经典多为本教“后弘期”（十一世纪以后）的产物，有可能将后来的知识掺入从前的历

史<sup>[70]</sup> 所以我认为本教史上的 Stag gzig,十有八九是指波斯<sup>[71]</sup> 而不是阿拉伯。

本教在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构成等基本教义方面都受到了祆教的影响。本教认为 在那混沌之初、鸿蒙未判之时 有一位南喀东丹却松大帝，他拥有五种本原的基质，赤杰曲巴祖师从他那儿把它们收集起来 放入他的体内 轻轻地“哈”了一声，于是便起风了。当风如光轮般飞快旋转时就产生了火。风吹得越猛，火烧得越旺。火的炽热和风的凉气产生了露珠。露珠上聚集着微粒。这些微粒随继被风吹动 刮在空中到处乱飞 从而积少成多 堆积如山。世界就是这样被赤杰曲巴（又名恩卓杰波）祖师创造出来的。五种本原的精华则产生出一个光明的卵和一个黑暗的卵。光卵是立方体，象一头牦牛那么大。黑卵呈角锥形，有一头公牛般大小。祖师用一个光轮打破光卵。在轮和卵的撞击中产生的火花散向空中形成了众托塞神（众散射神）向下照射的光线形成了众达塞神（众箭神），从卵的中心现出了斯巴桑波奔赤——一个长青绿色头发的白人，他就是现实世界的国王。格巴墨本那波（他与赤杰曲巴祖师作对）使黑卵在黑暗的王国爆炸 黑光上升 产生了无知和困惑 黑光向下 产生了迟钝和疯狂。从黑卵中心跳出来一个黑漆透光的人，他叫做闷巴塞登那波，是幽冥世界的国王。这两个国王分别是众神与群魔的始祖<sup>[72]</sup>。在本教的这些教义中，我们看到了对天宇（空间，即南喀东丹却松<sup>[73]</sup>）、对本原物质、对大气·风·光与火的崇拜，这些也是祆教教义的基本内容<sup>[74]</sup>。当然 从祆教到本教 宗教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神和恶魔的数量及作用也几乎完全不同。但是可以肯定本教是受波斯宗教特有的二元论<sup>[75]</sup>影响的。如上所述，赤杰曲巴与墨本那波、光明与黑暗、白与黑、善与恶、众神与群魔、现实世界与幽冥世界、创造与毁灭这些二重性构成了本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

应当肯定，本教最早还是产生于青藏高原本土，它的许多仪轨

实际上属于原始的萨满教内容<sup>[76]</sup>。因此，本教只是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受到祜教影响的所谓先饶米沃生于 Stag gzig 和本教传自 Stag gzig 的说法部分反映了本教发展的这段历史。很可能，先饶米沃就是把祜教因素带进本教从而使青藏高原上这一古老宗教开始系统化的主要人物。从现在研究的情况来看本教历史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应当发生在土观《宗教源流》所谓的“恰本”（khyar bon）时期<sup>[77]</sup>，尤其是吐蕃王朝（629—846）<sup>[78]</sup>建立前后。德国藏学家霍夫曼 H. Hoffmann，1912—）说：“西藏人还保存了一种传说，在松赞前五代拉陀陀日王时代，当时还是统治着雅隆一带的一个小国，就从天上降下了百拜忏悔经、佛塔、佛像等。但这仅仅是一种传说，很可能是接受了一个本教的传说，因为本教的传统是一切都来自天上，对天非常崇敬。”<sup>[79]</sup>藏族本教学者噶尔美认为：“也许公元七世纪本教已在采纳外来因素。”<sup>[80]</sup>这表明祜教传到青藏高原与它传入中原内地和北方草原差不多同时，即应在波斯珊王朝（226—651）定其为国教以后<sup>[81]</sup>。

总之，青藏高原从来就不是“孤立隔绝的政治单元”，它不仅自古以来就同祖国内地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同祖国其他地区一道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和大致相同的方向上发展，共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

### 吐蕃先民与早期历史概况

七世纪初叶，在西藏高原以逻些（今拉萨）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汉文史籍称之为“吐蕃”。

“蕃”是藏语 bod 的译音，本为藏族的自称。今天藏族人仍自称 bod pa 意思是住在藏区之人。有人认为，“蕃”这个名称可能来源于古代藏族所普遍信仰的本教（bon），bod bor 两字的写法在古藏文中可以互通。关于“吐蕃”一词的含义，学界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是藏语 Bod chen po “大蕃”的音意合译，有的认为是藏语 Stod

bod“上蕃·西蕃”<sup>[82]</sup>，但均未成定讫<sup>[83]</sup>。吐蕃一名也出现在公元八世纪上半叶铸成的和硕柴达木古突厥文碑铭上，读作 Tūpüt<sup>[84]</sup>。Tūp-一词在古突厥语中有“宗族”之意，因而有人认为，在突厥语言和突厥语文献中专称藏族或西藏地区的 Tūpüt-语，很可能是突厥语 Tūp和藏语 bod的合称，译成汉语意为“蕃部·蕃部众”<sup>[85]</sup>。不过，阿拉伯史家塔巴里（Tabari，839—923）的巨著《年代记》早在记述公元704年发生在中亚怛蜜（Timich）的一场战事中就提到有吐蕃人参加，写做 al-Tubbat<sup>[86]</sup>。从前人们以为，阿拉伯人中以商人苏莱曼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提到吐蕃（Tibat）为最早，该书编成于851年<sup>[87]</sup>。实际上，塔巴里《年代记》主要搜集阿拉伯人向东方扩张时各参战部落的见闻，其资料断代应当更早。流行的说法认为，西方人今天对我国西藏的称呼 Tibet就是传自阿拉伯人。但是，《阙特勤碑》东面第4行记载当时参加吊唁活动的既有吐蕃人，也有拂菻人（Purum，即东罗马）<sup>[88]</sup>，因而不排除西方人有关于吐蕃的直接消息来源的可能。

《新唐书·吐蕃传》追述吐蕃祖先的起源时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鹑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罕野。”一般认为，汉文古籍中的“西羌”泛指当时居于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的各部族，其语言大多属藏缅语族藏语支（包括羌语）和彝语支<sup>[89]</sup>。西羌既有一百五十余种，可见决非确指一部，不应与今天的羌族同日而语。发羌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西羌传》：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金城太守侯霸以诸郡兵及羌、胡人马破迷唐羌，“迷唐遂弱，其种众不满千人，远逾赐支河首，依发羌居。”赐支即析支<sup>[90]</sup>。应劭《风俗通义》：“河首积石，南枕析支。”意思是河首积石在析支之北。然而，自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于《桓帝纪》下误以唐都州龙支县（今青海民和、化隆间）南之唐述山<sup>[91]</sup>（今拉脊岭，即小积石山）为《禹

贡》之积石 仪凤二年(677)唐置积石军于廓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或作百八十里)之浇河城<sup>[92]</sup>(今青海贵德县)世人遂有以析支即今青海贵德一带之说<sup>[93]</sup>,乃至有将青海兴海县大河坝河确指为析支河的<sup>[94]</sup>。章怀之误已经王先谦等人辨正<sup>[95]</sup>。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认为:“盖西羌依析支而居,在今大雪山东南折北之处,故云河曲羌。当为今乌兰莽奈多浑岭东南境。”<sup>[96]</sup>此处大雪山即指今青海阿尼玛卿山(大积石山)查清代之乌兰莽奈多浑岭当即今甘、青、川交界之峨代山、欧木山一带<sup>[97]</sup>故赐支或析支应在今青海省久治县和四川省阿坝县一带。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秦献公(前384—前362)时有羌酋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犛牛种,越嵩羌是也。”同传又说:“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这些与《新唐书·吐蕃传》的记载是一致的。换言之,尽管《后汉书·西羌传》关于发羌起源的传说未必可信,但发羌的居地在今青海西南和西藏地区却是可以肯定的,因而他们作为藏族的先民也是无可怀疑的。

犛牛即牦牛。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世系表》所记吐蕃早期王统始自聂墀赞普(Khri nyag khri btsan po或Lde nyag khri btsan po),说他是天神之子,“降临雅砻地方来作吐蕃六牦牛部之主宰”(bod ka gyag drug gi rjer)<sup>[98]</sup>。因此,出自发羌的牦牛部很可能就是吐蕃的先民<sup>[99]</sup>。鹞提勃悉野据《通典》卷一九“吐蕃条”、《旧唐书·吐蕃传》当作鹞提悉补(勃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在记述松赞干布祖父辈的统一活动时多次提到了“赞普悉补野氏”(btsan po spu rgyal)<sup>[100]</sup>;《长庆唐蕃会盟碑》背面第5行称赞普为“圣神赞普鹞提悉补野”(‘ phrul gyi lha btsan po ' o lde spu rgyal)<sup>[101]</sup>,这些都证实了汉文史料的记载,即悉补野是吐蕃赞普王族的部落。研究者认为,雅砻的悉补野部本为吐蕃六牦牛部之一,从聂墀赞普开始,悉补野部落的首领同时成了六牦牛部组